羅振玉的收藏與出版：「器物」、「器物學」在民國初年的成立*

王正華**

【摘要】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羅振玉（1866－1940）可說是一位複雜且人生轉折多重的人物，既是收藏家、出版人、研究者與古董商，又是新式教育與農業推手、滿清遺老與滿洲國官員。羅振玉所涉及難以截然劃分黑白的政治與道德議題，已使其生平成為絕佳的研究對象，一生的作為更在清遺民與好古風尚（antiquarianism）兩項研究領域中成為獨特且重要的個案，值得深入探究。

本文集中討論民國最初十年間（約1911－1920），羅振玉以清遺民的身份所從事的古物出版事業。此一事業多半在其所寓居的京都完成，與其收藏息息相關。從羅振玉的收藏與出版中，可見其與「古物保存」實踐之間的關係，更可見傳統的收藏文化如何轉型至近現代的古物保存論述。更重要的是，羅振玉形構「器物」此一新的古物分類，並將傳統「金石」與「書畫」兩大分類，轉換成「器物」與「書畫」的二元統稱分類架構。基於此點，本文也論及羅振玉如何將「金石學」轉變成新興的「器物學」。本文除了重建羅振玉在傳統文化生產的近現代轉型中所佔有的重要位置，更企圖探討近現代中國對於古物觀念架構與實踐作為的轉變。

關鍵詞：羅振玉、古物保存、清遺民、中國收藏史、金石學的現代轉變

引言

羅振玉（1866－1940）不僅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學者、收藏家、出版人、藝品商，也是個集教育與農業改革者、前清遺老及滿州國官員等身份於一身的人

＊本研究獲得國科會年度計畫的補助，謹申謝意，並感謝京都大學平田昌司教授於筆者赴日研究期間慷慨的協助。本文初稿曾發表於2008年八月由Nixi Cura及楊佳玲教授所組織的羅振玉研討會，非常感謝兩位組織者的邀約。白謙慎及Robert J. Culp兩位教授曾於不同階段對本文提出寶貴的建議，受益良多。另外，感謝兩位匿名審稿人的意見，讓本文更為完整。本文原為英文，承蒙牛津大學劉宇珍博士翻譯成中文，在此一併申謝。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物。研究者近年來對其多采多姿的一生，以及在中國近現代史上所扮演的多樣且充滿矛盾的角色，有了更豐富的認識。① 晚清時期，他因倡議新學有功，而為張之洞等清末大員及清政府重用；當時代的巨輪一轉，1911年政治鼎革之際，他彷彿在一夜之間從晚清時聲譽卓著的改革提倡者，一變而為效忠前朝的保守勢力，與民國初年主流的社會文化思潮相對立。他雖尊尚中國古學，在保存傳統的種種作為（practices）上，卻又處處師法日本，且在日本所扶植的偽滿政權裡為官。他一生中時為大大小小的經濟問題所迫，掙扎在供養其家或實踐自身對學術與古物保存的使命之間。經濟壓力及學術使命雖驅使他廣蒐文物，並出版大量的書籍，使之成為中國史上最多產的作者與編者之一，卻也讓他蒙上傳統士大夫避之唯恐不及的市儈之名。

作為一個歷史人物，羅振玉所涉及難以截然劃分黑白的道德與政治議題，已值得研究者關注。本文則欲將焦點放在羅振玉於民國開國後的十年間（約1911－1920），以一介避居海外的前清遺老，對學術研究及古物保存等議題所進行的種種文化作為。藉由檢視羅振玉的收藏及其出版事業，本文將探討近現代中國史上與古物保存息息相關的重要課題—「古物」的重新定義與重新分類。新定義與新分類不僅賦予「古物」一個嶄新的思考架構與歷史意義，「古物」亦反過來賦予保存論述「實質」（materialistic）的內涵，對於何謂「中國」形成新的認識。此一對「中國」的新認識是建立在一件件具體的物品上，而非只是典籍中斑斑記載的文獻內容。羅振玉可說在這過程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他將各色各樣的歷史物品都收納在古物保存的論述裡，而新的分類、新的思考架構亦由此應運而生。時至今日，我們對這些古物的看法，仍脫離不

① 見Shana Julia Brown, "Pastimes: Scholars, Art Dealer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1870-192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3)；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社，2009）；張惠儀，〈遺老書法與新出土書法材料—二十世紀中國書法發展的契機〉，《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9期（2005年9月），頁163-208。關於羅振玉在蘇州的教育改革，見Peter Carroll, *Between Heaven and Modernity: Restructuring Suzhou, 1895-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19-124. 此外，Nixi Cura在2007年3月24日美國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的年會上，組織了以滿清遺老文化活動為主題的專場（panel）；除筆者外，參加者尚有白謙慎、Shana Brown、Joshua Fogel，而羅振玉即是此專場中最常提及的人物。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了羅振玉所提出的思考架構。

羅振玉對於古物保存的種種見解雖萌芽於清末，其實踐卻要等到民國後的十年之間。在此十年間，別人視他為滿清遺老，他也自認為是滿清遺老，遺老身分毫不模糊。和其他的清遺民一樣，他的政治與文化理念總似緊密相連。當舊時代的價值觀隨著滿清政權的崩解而漸被揚棄，一股存亡繼絕的迫切感，驅使羅振玉積極地實踐其古物保存的理念，遂在1910年代清楚表述這些文化主張。羅振玉忠於清室、甘為遺民的政治選擇，實與其保存古物的種種文化作為密切相關，尤其可自其在辛亥革命前後的文化活動中窺知。在清廷傾覆前，羅振玉展現更宏觀的企圖心，等到民國肇建、自己成了人人眼中保守的清遺民後，他才專心於古物保存及相關的學術研究。

本文之作，橫跨當前中國研究的兩個新興領域—古物保存與清遺民研究。近年來，好古之風（antiquarianism）作為一學術課題，已吸引來自人類學、考古學、歷史學與藝術史學等背景的學者從事跨領域的研究。中國悠長的史學傳統與尚古之風，更令此議題充滿了前景。然而，除了中國自身所具有的緜長傳統之外，對中國好古之風的研究實仍處於蒙昧不明的狀態，尚未結成可連篇累牘討論的果實。其中固然不乏開創性的研究，卻仍缺少大批學術成果的厚實積累。② 對於古物及好古之風在近現代的轉化所知更少，例如：二十世紀初不同政府、民間團體與個人關於古物保存的論述與實際作為。本文意欲填補此一空白，以羅振玉為切入點，檢視其古物保存的理念如何在他成為清遺民後的十年間，落實於物質的層面上發揮作用。

---

② 關於中國好古之風的開創性研究，見Jessica Rawson, "The Many Meanings of the Past in China," in Dieter Kuhn and Helga Stahl, eds., *Die Gegenwart des Altertums: Formen und Funktionen des Altertumsbezugs in den Hochkulturen der Alten Welt* (Heidelberg: Ed. Forum, 2001), pp. 397-422; Craig Clunas, "Images of High Antiquity: The Prehistory of Art in Ming Dynasty China," in *Die Gegenwart des Altertums*, pp. 481-492. 陳芳妹，〈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0期（2001年），頁37-160；陳芳妹，〈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第23卷第1期（2005年秋季），頁267-332。此外，可見近期出版的相關新書。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The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重新評價清遺民及羅振玉

學界對羅振玉的興趣，代表著進一步理解這批忠於清室之菁英世代的更大企圖。③ 此企圖促成對清遺民的重新評價，特別是清遺民在民國紛擾政局中的立場，以及他們在傳統菁英文化轉型至現代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姑不論個別學者用以探索的角度是否有所異同，總體的研究成果可說更豐富了民初政治、社會及文化所呈現的歷史圖像。

對清遺民的負面報導可追溯至辛亥革命成功之始，於民國初年更是屢見不鮮。被譏為「遺老」的這批人，是民初公眾媒體批判撻伐的一大門類。他們既然仍以皇清子民自居，其公眾形象自不可免的與失勢的王朝相連。在政治上，他們被當成貪得無厭、鎮日權謀、處心積慮籌畫復辟的野心份子；在文化與社會上，他們又因所效忠的君主政體及其相應的價值（如傳統的家庭倫理等），而顯得過時迂腐，甚至有害於現代化新中國的未來。④

再者，當今主流的史觀亦多側重於促成中國現代化的元素，將新文化運動（約1916年至1920年代初）描繪為主導中國現代歷史軌跡，甚至是唯一的思想、政治、社會與文化潮流。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基礎中來自海外的新成分，以及這運動本身所造成的社會文化劇變，不僅早已是學者們關注的焦點，也決定了歷史敘述的基本調性。⑤ 即使在討論所謂與新文化運動相對立的「文化保守

③ 關於近期清遺民的研究成果，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4-14。

④ 雖然只有少數清遺民積極參與復辟運動，然報章所載的清遺民形象仍是如此，既片面又偏頗。例見《晨鐘報》，1916年9月26日、10月1日、11月11、17日；1917年3月20、23日、4月24、27日、5月2日、6月20、25日、8月13、17日、9月5、20、26日、10月24、25 日、11月1日；1918年1月11、24日、2月4、10、18日、3月4、9日、4月15日、5月8、31日、6月7日。近期研究亦顯示清遺民在二十世紀初期多給人負面的觀感，見張惠儀，〈遺老書法與新出土書法材料—二十世紀中國書法發展的契機〉，頁163-208；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第五章。

⑤ 近年來，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的學者在看待新文化運動對歷史撰述的影響時，已有了不同的見解。見David Der-wei Wang,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52; Rana Mitter, *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義」的研究裡，亦見不到清遺民的蹤跡。⑥ 學者們在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時，多半選擇討論那些積極參與各種思想及社會文化論辯的人物。即便「文化保守主義」此一標籤可包含不同背景的知識份子，且各有其擁護的政治、社會及文化觀點，清遺民仍因其與當代主流的論辨看似無關，而隱身於歷史舞台之後。⑦

若以革命史觀看來，1911年的辛亥革命賦予民國正當性與正統的地位，清遺民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遂顯得邊緣，評價亦多屬負面。無論在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版本裡，辛亥革命都是正面且積極的歷史過程，推翻帝制政權，結束封建時代。⑧ 部分清遺民其後在滿洲國為官，更被視為背叛民國的理想，乃是國族的叛徒，清遺民的歷史形象於此更墮入無可挽救的地步。

相較於史冊中高度評價的南宋（1127－1279）及明（1368－1644）遺民，歷史對清遺民的貶抑更顯得特殊。「忠君」的道德標準原是維持王朝政權的重要支柱，在清遺民身上顯然並不適用。⑨ 史家對於明、清遺民迥然不同的歷史評價，似乎也不全然只因為清朝是滿洲人、而非漢人所建立的政權。更重要的是，有一股對滿清及其一切相關價值的敵意，於清末民初之際瀰漫於中國，成為集體心理。這雖不在本文的討論範疇之內，然若以研究明遺民的熱忱，對清遺民的社會文化及思想背景作進一步地了解，必能對民初這一段重要的歷史有更深刻的認識。主流的歷史研究不管對新文化運動有如何多面向、多角度的理解，清遺民的歷史都無法進入新文化運動的研究議題之中。當明遺民多采多姿的藝術與思想表現，已被公認建立了十七世紀下半葉文藝的黃金時代，清遺民

⑥ 例如，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⑦ 王國維（1877－1927）可說是唯一的例外。他被視為學術泰斗，而其投湖自盡的悲劇性結局，更使之成為二十世紀初年世風劇變下，仍能堅守道德與文化節操的知識份子典範。見Joey Bonner,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第四章。

⑧ 中共的歷史版本以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為本，將辛亥革命視為布爾喬亞階級革命，之後便是共產階級革命的時代。

⑨ 筆者瞭解南宋、明朝與清朝遺民的道德與政治訴求並非只是「忠君」如此簡單，但此處主要論點是突顯清遺民在史冊中被忽略的現象，無須處理不同朝代遺民對於新舊政權的對應態度與思想脈絡。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社會文化角色及其歷史意義，仍有待探索。

然而，本文之所以重新定位清遺民，並不在於他們是史學裡常被忽略的一群，而是因為他們的確在中國近代傳統文化生產的轉變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此處所謂的「傳統文化生產」（traditional cultural production），指涉文人階層的文化，特別是足以宣示文人文化特色的藝術及古物收藏作為。大多數的清遺民都屬於末代仕清的文士，原本即為政治、社會與文化上的菁英。他們自小受傳統的儒學教養與科考教育，長而投入仕途，除了為官之外，尚飽讀詩書，學養深厚。例如，清遺民中有多人在傳統詩學與中國詩史上佔有一席之地，如沈曾植（1850－1922）、陳三立（1852－1937）與況周頤（1859－1926）等。

晚清逐漸制度化的新式學校教育，以及1905年的詔廢科舉，對原本培育知識份子的社經環境產生了極大的沖擊。許多主導民國社會文化及政局發展的人物，多曾留學歐美或日本。即以新文化運動中互相對立的知識份子陣營為例，無論支持或排拒新文化運動所提倡的西方價值與思想，他們分享同樣的思想與社會文化資源，而西方價值在中國社會的流衍與影響，更是他們共同關心的議題。⑩ 反之，屬於舊世代的清遺民，除了效忠覆亡的清室之外，則致力於傳統學術與文化價值觀的發揚，更不欲以西方的價值衡量中國所面臨的社會文化問題。

清遺民在藝術、文學及學術等領域裡的活動，不只意在傳承文人階層種種的文化作為，更促成了傳統文化生產的轉化。因此，從清遺民的文化生產入手，實可提供一個探討傳統文化如何參與近現代中國極其複雜之轉型過程的社會與文化脈絡。這些傳統因素或許還比那些自海外輸入的思想、社會、文化因素，更具關鍵性。

中國的藝術收藏文化至清朝時，早已蔚為大觀。參與收藏活動的人除了帝王、貴族外，主要來自兩種社會階層—文人與巨賈。清代時，豪商巨富雖仍以收藏古代字畫為主，士大夫的文化資本卻已投入青銅器與銘文、碑文等拓本的範圍。青銅器與碑石上的古文字，經過墨拓而成拓本；這些古文物，正是清代

⑩ 此處指的是學衡派與新文化運動陣營的對立，見沈松僑，《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4）。謝謝林志宏教授的提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主流學術「金石學」的研究對象。對一些清代士大夫而言，作為一金石藏家，實可累積文化資本以發展社交網絡，並鞏固官僚圈裡的政治結盟。職是之故，這些古物在金石學勃興的時代中，指向收藏家的淵博學識。

從收藏家吳雲（1811－1883）、陳介祺（1813－1884）、潘祖蔭（1830－1890）、吳大澂（1835－1902）、王懿榮（1845－1900）及端方（1861－1911）所留下的著作，可窺知他們如何熱切地想了解自己的藏品，亦可一探當時收藏文化如何滲透於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⑪ 這些收藏家熱衷出版關於自家藏器的研究，書裡並配有拓本或器物的圖像以供讀者參校。⑫ 身兼收藏家、學者、出版人的現象，雖非史無前例，卻在晚清時日趨普遍，成為抬高個人聲價的重要方式。⑬ 他們其中更有採用當時最先進印刷技術的藏家，如攝影、石印

⑪ 例如，端方之所以熱衷於收藏與鑑賞，即是為了打入高官收藏家的圈子。關於晚清專研金石學的士大夫藏家，見浅原達郎，〈「熱中」の人—端方伝〉，《泉屋博古館紀要》，第4號（1987），頁68-73；Thomas Lawton, "Jin Futing, A 19th-Century Chinese Collector-Connoisseur,"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54 (1989-1990), pp. 35-61; Thomas Lawton, *A Time of Transition: Two Collectors of Chinese Art* (Lawrence: Spencer Museum of Ar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1), pp. 5-64; Thomas Lawton, "Rubbings of Chinese Bronz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 67 (1995), pp. 7-48; 中村伸夫，〈王懿栄〉，《中国近代の書人たち》（東京：二玄社，2000），頁128-161；Shana Brown, "Pastimes: Scholars, Art Dealer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1870-1928," pp. 52-57; Jason Steuber, "Politics and Art in Qing China: The Duanfang Collection," *Apollo* (November 2005), pp. 56-67. 陳介祺與同代收藏家的通信表露了當時士大夫階層對於青銅器、拓本及古文字學的熱忱。見陳介祺著，陳繼揆編，《秦前文字之語》（濟南：齊魯書社，1991）。承蒙雷德侯教授告知Thomas Lawton的著作，在此謹表謝忱。

⑫ 見吳雲，《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收入《金文文獻集成》，卷7（香港：明石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 508-558；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收入《金文文獻集成》，卷7，頁559-611； 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蘇州：振新書社，1883）；端方，《陶齋藏石記》（自印本，1909）。

⑬ 許多致力於金石學研究的宋代士大夫，集收藏家、作者及學者的身份於一身。見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1927），頁45-49。其中有不少人亦推動藏器圖像的流通；然而，他們是否也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仍是一大問題。見Ya-hwei Hsu,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the Era of Print, 961-1279"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2010), chapter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都是為了展示並流通自家藏品。⑭

一般而言，石印法因價廉，於1870年代至1905年間，出版大量的科舉考試用書。當用於複製古物或拓片時，石印因出版量大，其觀眾亦廣，遠非舊時三兩位收藏家與士大夫同好所組成的小圈圈可比。⑮ 然而，上述這些收藏家並未點明其預設的讀者群，也未將其出書旨趣與大眾教育或以「國家」為單位的古物保存使命相連結。相較之下，下一個世代的收藏家，如清朝最後幾年逐漸在出版文化與收藏界嶄露頭角的狄葆賢（1873－1939），則明確提出欲透過大眾教育的手段來保存中國所有的古代文物，明顯與前一代的收藏家不同。⑯

羅振玉也是這麼一位收藏家；他對自身藏品及出版事業亦有極為清晰的想法。表面上他似乎承繼了吳大澂以來的金石學傳統，集收藏家、學者及出版人的身份於一身。然而，羅振玉如何看待自家的藏器、又如何賦予這些藏品文化意義，實較其繼承晚清士大夫好古之風的面向來得重要。從羅振玉身上，可知此時文人士大夫出版個人藏器的觀念架構已產生了質變，大眾教育與國家遺產觀念架構的出現，讓近現代時期的古物保存有別於傳統。在國家遺產觀念下的古物保存，對於古物的定義與歸類方式，亦已有了嶄新的理解。

羅振玉不僅不同於傳統的收藏家，與二十世紀初年其他的收藏家相比，也有相異之處。如前所述，晚清興起的一批收藏家如狄葆賢等人，多半視出版自家藏品為大眾教育的一環，用以促進國家框架下的古物保存；然民國成立之後，這樣的焦點亦有所轉移，狄葆賢等人的古物出版更形商業化。⑰ 羅振玉亦

---

⑭ 注12所提及的最後兩本書即以石印法印成。關於這些收藏家如何運用新引進的複製印刷技術，見Thomas Lawton, *A Time of Transition: Two Collectors of Chinese Art*, pp. 13-14；陳介祺著，陳繼揆編，《簠齋鑑古與傳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 76、79。

⑮ 關於晚清對石印技術的廣泛使用，見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pp. 88-127.

⑯ 端方可說是介於新舊世代間的人物。他死於1911年清朝尚未覆亡時，但其藏品又多見於新世代收藏家的出版品中。關於提倡大眾教育、國家遺產及古物保存的出版家，見Cheng-hua Wang,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Collotype Reproduction of Antiquities in Modern China, Circa 1908-1917," in Joshu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Modern Chinese 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1).

⑰ Cheng-hua Wang,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forthcom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保存古物之心來發展其出版事業，其初衷並未隨著新政權的建立而改變，另一重要的相異點則是羅振玉對學術研究的高度重視。他幾乎是窮盡一切可能地尋求並出版耳聞眼見且值得深究的古物，更發展出新的學術研究方法。羅振玉的一生，多致力於編輯與出版這些古物，自古籍（包括僅見於日本的稀有版本）、新出土的文物與壁畫，以至年代久遠的銘文、銅器、石碑等，無不遍收。其所出版的古文物圖錄，無論在質量或視野上，俱洋洋可觀。⑱ 據此而論，羅振玉經手過的古文物，其數量與多樣性遠超過當時其他收藏家。圖錄裡更有他撰寫的文章，再加上其他林林總總的研究及私人筆記，我們可藉由得知羅振玉所認知的「古物」概念究竟為何，也可思考此概念如何於二十世紀初年有所轉化。

羅振玉可說是清遺民中最受爭議的人物之一。除了滿洲國的經歷之外，眾人皆認定其與王國維之投湖自盡脫不了干係，因錢「逼死」之說更不脛而走。⑲ 再者，羅振玉之涉足於中日古物交易市場，甚至在其中扮演主角，⑳ 以國族主義的辭令看來，沾染上「市儈」之氣已是錯誤，背負了國族文化叛徒的惡名更不可原諒。在二十世紀初年，古物開始被認定是「中國之所以為國」的要素之一；古文物即使經由合法的買賣與管道流至異域，也被視為中國的一大損失，甚而引為國恥。㉑

羅振玉在清末民初各種文化作為中所扮演的角色，實足以在二十世紀中國

---

⑱ 關於羅振玉所編輯與出版的完整書目，見《羅雪堂先生校印書籍價目》，收入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28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111-129。此乃羅振玉在天津的書目廣告。

⑲ 傳言多謂王國維讓羅振玉給逼上絕路，有可能是因為王積欠羅的債務。見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 280-281.

⑳ 見Zaixin Hong, "Moving onto a World Stage: The Modern Chinese Practice of Art Collecting and the Impact from the Japanese Art Market" and Tamaki Maeda, "(Re-) Canonizing Literati Paint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The Kyoto Circle Luo Zhenyu, Harada Gorō, and Naitō Konan," in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Modern Chinese Art.*

㉑ 見Cheng-hua Wang, "The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 Circa 1905-1925: National Humiliation,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Exhibition Culture," in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The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p. 320-3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化生產的研究中自成一章。眾多的爭議忽略了羅振玉對於中國傳統收藏文化之轉化，更少見學者觸及羅振玉在古物學研究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如是之故，本文欲藉著羅振玉的文化生產，探討「器物」（即三度空間、立體的古物），如何在中國近現代種種與古文物相關的論述與作為裡，漸漸成為一個特定的類別（category）。本文亦討論「器物學」（即對於三維、立體的古物的研究）如何從傳統的「金石學」發軔，與新興的「考古學」對應，建立成一個研究領域。

二、京都時期的出版事業

羅振玉出身衰落的仕宦之家，本身亦無功名，卻因推廣農業與教育改革新知，且積極參與辦報與結社等知識份子的新式社會活動，而在清末的官場崛起，曾為張之洞幕僚，也在學部任職。㉒ 官場之外，他對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亦影響深遠，在中國古文字學及上古史的領域有所建樹。㉓ 甲骨文不過是羅振玉「古物保存」中的一環，另有更宏大的歷史圖像值得我們觀察。

清朝末葉，知識分子有鑒於外國人搜求中國古物之風日盛，也見識到日本古物保存運動的前例，遂號召國人保存歷史文物，保存國粹。這些號召的知識分子橫跨不同的政治陣營，有的維護帝制，有的鼓吹立憲，亦有追求共和革命者。他們對於政治體制的看法是否影響其古物保存作為，仍未可知。然而，清末古物保存理想確實橫越政治陣營的壁壘，以「中國」作為國家單位的觀念架構進行古物保存。羅振玉位於這波風氣的先驅，也是舉足輕重的倡議者。

㉒ 羅振玉組織許多社團以推廣新學、普及日文，並曾編輯《農報》、《教育世界》等刊物。關於其生平，可見羅振玉，《集蓼編》，收錄於《雪堂自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9），頁1-123。

㉓ 見李濟，〈探索階段：甲骨文的搜集、考釋和初步研究〉，收於氏著，《安陽》（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19-37。Shana Brown的博士論文大篇幅地討論了羅振玉在甲骨文之出土、保存與公開所扮演的角色。見“Pastimes: Scholars, Art Dealer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1870-1928,”chapter 3. 另見白謙慎，〈二十世紀的考古發現和書法〉，收錄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1901－2000 中華文化百年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99），頁244-2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羅振玉大約在1902年左右開始在中國提倡古物保存的理念，較其他知名人物如張謇（1853－1926）、鄧實（1877－1951）等，都要來得早。㉔ 1902年時，日本政府在全國施行的古物保存運動，已推行了三十多年，相當有計畫地重新定義、分類、清查、登錄、出版及研究古物。㉕ 當這個運動的餘波在清朝末年傳到中國時，掀起令人驚訝的巨浪，拍醒成群的知識份子，而日本政府的舉措成為晚清有志之士在古物保存議題上的依歸。可惜的是，原本該由中央朝廷或政府來推行的國家政策，卻因清朝的忽然滅亡，而繼起的政權無力掌控全局，即使在「國家」的觀念架構下企圖推動古物保存措施，實質上卻無法由治權統一的政權實行全國性的古物保存。㉖ 相比之下，羅振玉似乎一人包辦了政府在古物保存上應有的作為，在毫無政府奧援的情況下，實現古物保存的理念。在當時的觀念下，此理念最好的實踐場所就是出版品。

在晚清知識份子的眼中，「出版」也是一種「展覽」形式，其重要性並不亞於博物館，更是古物保存的首要手段。然而，民國肇建之後，出版作為古物保存的重要實踐方式，卻不見發揚光大，在上海的書籍市場中反而日趨式微。羅振玉在民國時期仍堅持出版，屬於少數。表面上看來，羅振玉販賣古物至國外的行為，似乎違背古物作為國家遺產的觀念，但在當時生活困境下，其經手的古物為其所發表者仍屬大量，實為難得。就是透過出版，一種抽象的國家遺產觀念得以形成，雖然這些發表的古物並不一定保存在清朝或中華民國所治理與管轄的地理範圍之內。例如，羅振玉出版法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

㉔ 見羅振玉，《集蓼編》，頁17。例如，就筆者所能取得的1906年的《教育世界》，羅振玉便發表好幾篇專論古物保存的文章。關於張謇與鄧實，見Cheng-hua Wang,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Cheng-hua Wang, "The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 Circa 1905-1925," pp. 320-341.

㉕ 見岡塚章子，〈小川一真の「近畿宝物調査写真」について〉，《東京都写真美術館紀要》，第2號（2000），頁38-55；水尾比呂志，《国華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社，2003），頁 7-16；鈴木広之，《好古家たちの十九世紀》（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頁7-18。謝謝小川裕充教授提供水尾比呂志的著作。

㉖ 北洋政府曾於1916年進行古物普查，但治理區域僅限北京周圍的河北、河南、山東與山西，且普查過後，未見相應的保存措施。在此普查的說明中，明白表示繼承清末未能完成的工作。見Cheng-hua Wang,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forthcom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45）收藏的敦煌古文書，也根據日人大谷光瑞（1876－1948）收藏的西域文物進行高昌歷史的研究及出版。㉗ 這些收藏於國外的古物，一旦形之出版，更彰顯「國家」框架下古物保存的重要性與意義。

對晚清提倡「古物保存」的知識份子而言，政治立場影響他們對於清朝正統與否的判斷，但在「國家」框架下保存古物的理念仍為一致，即使這個「國家」無法落實於某個具體的政權上。就羅振玉而言，中華民國不是他所效忠的政權，但古物屬於「國家遺產」必須保存於出版品中的觀念，仍是其投注心力於出版業的重要原因。二十世紀初年中國古物保存論述中的「國家」觀念值得進一步的探究，不過就羅振玉的例證看來，古物所存的具體空間如果無法在中國的地理範圍之內，或許其保存在出版品中的抽象空間更形重要，而且此種保存並未損於該古物作為中國此一文化傳統之遺產的地位。

晚清時期的羅振玉已經積極參與古物的出版，在當時最新式的珂羅版刊物上發表了許多古物的圖像。珂羅版是一種照相印刷技術，常用來製作高品質的藝術與古物的圖像複製品。因其運用了照相技術，能有多層次的感光，遂可複製細微的色調變化，表現木版或石印技術所不能的灰階效果。晚清早一輩的收藏家如吳大澂等人，雖也將其藏品以石印出版物的形式公諸於世，這些出版品的效果、普及性與商業性，皆遠不如1908年在上海書市興起的珂羅版複製品。珂羅版出版品無疑地為出版者帶來豐厚的經濟收益，但公開宣稱的出版目的卻在於教育大眾，向大眾公開在過去只有少數人才能一見的珍貴文物。出版參與者如張謇、鄧實等人理念的真誠度，應毋庸置疑。即使商業利益為出版的考量之一，珂羅版出版品確實是將中國古文物轉化為國家遺產的重要管道。雖然衡量當時的政治狀況，所謂的「國家」，僅在理論的層次上實踐，而實際的政府並未參與拍攝或出版古物。㉘

終清之世，羅振玉都未曾親身出版自己的收藏。然因其藏品散見於當時風行的珂羅版刊物，如鄧實出版的《神州國光集》等，故可知羅振玉對於珂羅版的複製活動也樂觀其成。㉙ 只不過清季之時，羅振玉將重心放在與政治機構、

㉗ 見董作賓，〈羅雪堂先生傳略〉，《中國文字》，第7冊（51年3月），頁3。
㉘ 見Cheng-hua Wang,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forthcoming)."
㉙ 見Cheng-hua Wang,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forthcoming)."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政府部門有關的改革上；㉚ 直到1911年滿清覆滅，羅振玉附隨在政府機制中的改革之路隨之中斷，才「迫使」他轉而投身於文化事業。

羅振玉對古物保存與研究的努力，於1912年至1919年這段期間開始深化。他當時以清遺民身分，在日本京都過著自我放逐的生活。他既已在政治、社會與文化議題方面不見容於故鄉，又與所處之日本社會不無扞格；這雙重的流離感，想必讓他更強烈地意識到本國文化的危急處境。㉛ 他在京都時期所編著的五十多本書，在在表露了這份憂患感。在這些書籍中，羅振玉所收藏、借觀實物及見過影像的古物，首度藉由珂羅版的印刷技術呈現在中國讀者眼前，其中還包括許多重要的考古發掘。㉜

羅振玉在京都時似乎已建立起一套日常的起居規律，好讓他過著集收藏家、出版人、研究者與古物商於一身的生活。層出不窮的經濟問題迫使他必須靠著買賣古物而過活，經由羅振玉之手而賣至日本的古物相當多，其中良莠不齊、真偽紛雜之狀，尚待進一步的研究，而羅振玉在買賣之間的諸種考量，也有待釐清。無論如何，羅振玉保存下來的古物在數量上相當驚人，也包括對於中國歷史文化極其重要的甲骨與敦煌文書。若非身兼古物商人等數種身份，羅振玉或許無法經手與過眼如此大量的中國古代文物，也無法有如此數量的出版品。

從他與王國維的通信中可知，羅振玉在京都的日子，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研究古物、出版古物上。他積極地尋找某些特定的器物並攝影為記，企圖以珂羅版的技術複製這些器物圖片，好與他所作的研究文章或筆記一起出版。㉝ 因

㉚ 如羅振玉曾於1901及1909年兩度赴日考察教育、財政及農業制度。見羅振玉，《扶桑兩月記》、《扶桑再遊記》，收於張本義、蕭文立編，《羅雪堂合集》，第6冊（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感謝陳正國教授幫忙蒐集兩書。

㉛ 羅振玉不諳日文。雖有些頗具影響力的日本友人，他基本上過著孤獨的生活，鎮日憂心中國的政治與社會文化情況。在旅居京都的八年間，他也經常回中國作短暫停留。見羅振玉，《集蓼編》，頁40-44；羅繼祖，《我的祖父羅振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頁93-113。

㉜ 羅振玉之孫羅繼祖認為羅振玉在1912年至1919年間最重要的成就，正是編輯與出版。羅繼祖更整理條列了其祖父於京都期間所出版的所有書籍，見《我的祖父羅振玉》，頁101-103。

㉝ 特別是1916年的往來信件，多在討論如何出版這些古文物。見王慶祥、蕭立文校注，《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2000），頁26-2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珂羅版印刷所費不貲，羅振玉只得與當時在上海由猶太巨賈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51－1931）及其妻羅迦陵所主持的廣倉學窘合作，以完成其出版計劃。㉞

早在1909年時，羅振玉即提到以珂羅版技術複製古物的殊勝，見於其出訪日本考察農業教育的筆記中。當時，東京一家出版社的老闆向他展示珂羅版印刷品如何地忠於原作，而小川一真（Ogawa Kazumasa，1860－1929）的成品更是上上之選。㉟ 以保存古物為名而成立的《國華》雜誌，裡頭精美的珂羅版圖片，便出自小川一真之手。小川一真更幫忙建立國家級的古物照片檔案；此照片檔案被視為日本古物保存、調查與分類計畫的第一步，足見小川一真在古物保存運動中的關鍵地位。㊱ 在羅振玉的出版事業裡，亦可見珂羅版印製技術與古物保存的理念緊密結合。如前所述，珂羅版雖昂貴，其效果卻非其他印製技術可望其項背；尤其是日本的珂羅版技術，遠較中國更為進步。故羅振玉不惜血本，堅持以珂羅版印製古物。㊲ 當羅振玉將古文物攝影製版成珂羅版圖片後，有的在京都就地出版，有的圖片則寄往上海，由哈同所支持的廣倉學窘編入叢書《藝術叢編》出版。

廣倉學窘的主事者不具備任何學術能力，王國維雖曾任《藝術叢編》的編輯，羅、王兩人仍對學窘頗多微詞。㊳ 該叢書的題名並非羅振玉決定，但其基

㉞ 見羅繼祖，《我的祖父羅振玉》，頁99。羅振玉在京都時期所出版的一些圖錄與書籍上也有「廣倉學窘」的出版字樣。廣倉學窘由哈同的妻子羅迦陵所組織，用以推廣金石學的核心—古文字學，這個社團也常舉辦以古物研究為中心的展覽與收藏活動。關於哈同的文化活動，見唐培吉，《上海猶太人》（上海：三聯出版社，1992），頁 77-81; Chiara Betta, "Silas Aaron Hardoon (1851-1931): Marginality and Adaptation in Shangha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1997), chapter 5.

㉟ 見羅振玉，《扶桑再遊記》，頁4。然羅振玉誤記為小川真一。這家東京出版社指的應當是田中文求堂；羅振玉在天津時的出版品，都交由這家出版社負責流通。見《羅雪堂先生校印書籍簡目》，頁128。

㊱ 見岡塚章子，〈小川一真の「近畿宝物調写真」について〉，頁38-55；水尾比呂志，《国華の軌跡》，頁7-16。

㊲ 如羅振玉，《古明器圖錄》（自印本，1916）、《高昌壁畫精華》（自印本，1916）、《殷墟古器物圖錄》（上海：廣倉學窘，1919）。關於日本製珂羅版印刷品如何地忠於原作，見Cheng-hua Wang,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forthcoming)."

㊳ 見收錄於《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裡1916年的信件，特別是頁28-29、50-60、6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架構及文化意義仍須仰賴羅、王兩人的構思。羅振玉在1916年為《藝術叢編》所寫的序言中，提出「藝術」並非只是壯夫不為的雕蟲小技，而是古人意匠之展現；該叢書裡所發表的某些歷史文物，甚至可用以考究古代中國的典章制度。㊴ 這項宣示不僅賦予了藝術與文物一層嚴肅的意義，也標誌了甲骨與青銅器在歷史研究中的地位，因其與古代的禮制與政事密不可分。《藝術叢編》裡關於古物的分類，則循王國維之見，將之分為「金石」、「書畫」與「古器」（「古器物」之簡稱）。㊵ 「古器」，實等同於羅振玉於序言裡所提到的「器物」一詞。

羅、王兩人對《藝術叢編》既無主導權，我們自不必細考《藝術叢編》的編輯原則；但對於「藝術」一詞所指涉的範圍、其相關字詞錯綜複雜的使用脈絡，以及羅、王所提出的三個分類，卻值得進一步深究。「藝術」一詞於廿世紀初年的古物保存風潮中興起，在當時的情境中，有時與西方的「art」觀念相對應，有時又與「古物」相混，其指涉意義的定型化則要等到1910年代中葉。中國文言裡有不少詞彙，其意義在十九世紀末期時為日人所轉化，並重新輸入中國，「藝術」就是如此的一個詞彙。它在文言裡，原泛指所有需要運用到手工的技術，然在現代中文裡，其用法卻多限於指稱西方「art」的概念，包含一切的藝術品，高低品秩皆有。㊶ 當羅振玉在1910年代下半葉出版《藝術叢編》時，對何謂「藝術」、「藝術」與古物保存的關連等議題無甚興趣。他的戰場，實不在此。對他而言，「器物」一詞的範圍，以及關於此一新創古物類別的研究，才是重點。

羅振玉與王國維為《藝術叢編》所立下的三個類別，彰顯中國古代文物在

㊴ 見羅振玉，〈藝術叢編序〉，收於《殷虛書契後編》（上海：廣倉學窘，1916）。這個版本的《藝術叢編》見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然東京國立國會圖書館的版本卻無羅振玉的序言。這時期的珂羅版印刷品，包括《藝術叢編》本身，可能都經過好幾次重印，有時是全本重印，有時只是部分重印，故很難查知第一版的確切情況。

㊵ 見《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40。羅振玉自己還多了「雕刻」這個類別，不過王國維並未遵從。

㊶ 見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3), p. 2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廿世紀初年古物保存架構下的分類轉變（categorical transformation）。為了討論這重要的轉變，我們必須檢視羅振玉在1910年代所編輯與出版的書籍，以便考察「器物」這個新分類如何興起，並改變古代文物的分類架構。其中，以發表墓葬用器、製器模范及殷墟出土物品的圖錄最為重要。㊷

三、「可堪收藏」與「可資研究」

羅振玉對古物的出版與研究，離不開他個人的收藏活動與收藏品。他的收藏眼光與藏品橫跨「可堪收藏」（the collectable）與「可資研究」（the researchable）的界線，收入過去中國鑑藏系統中所未包容的物品。這不僅擴充了所謂「可堪收藏」之古文物的範圍，也標誌了收藏文化本身的一大轉變。

一般而言，古文物在晚清時期被分為「金石」與「書畫」兩類。「金石」多指銅器與銅器或石碑的拓片；「書畫」則指書法與繪畫。「書畫」一類，自六朝（220－589）以降即固定不變。㊸ 當日後的藝術批評以「用筆」為兩者共通的鑑賞原則而提出「書畫同源」的理論後，「書畫」自成一類的分類觀念遂更加鞏固。「金石」一詞雖起源甚早，卻要到宋代（960－1279）時才真正成為一門嚴肅的學問。當時對金石有興趣的學者，多致力於編纂目錄，並透過銅器等的形制及其上所鐫刻的文字，以考究上古的禮制與歷史。㊹ 故金石學乃是基於某種特定的智識追求而生的學問，其所看重的材料，亦以具有古文字學價值的物品為尚。有宋一代，銅器與碑銘拓片是「金石」底下主要的次門類。一直要到清中葉「金石學」復興後，其他種類的物件像是磚瓦等，才有系統地漸次

㊷ 見羅振玉，《古明器圖錄》、《殷墟古器物圖錄》及《古器物范圖錄》（自印本，1916）。這三本圖錄都收在《藝術叢編》裡。有些羅振玉的收藏則另行出版，並附有一冊獨立的圖版說明，見《雪堂所藏古器物圖》（天津：貽安堂，1923）、《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收錄於《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第6冊（臺北：大同書局，1973），頁2581-2592。筆者所見的版本是1923年版，然根據羅振玉在《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的自序，初版應在他旅居日本時便已發行。

㊸ 例如：范曄，《後漢書》，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頁269。

㊹ 見王國維，〈宋代之金石學〉，頁45-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納入「金石」的研究範疇。至廿世紀初年，新出土及新發現的文物大增，「金石」的內容再變，納入了如甲骨、古陶器及墓葬用器等類別的文物。㊺ 羅振玉的收藏與出版活動，在在展示了這個大轉變，甚至可說促進了此一轉變。

試舉墓葬用品說明。歷來稱之為「明器」，指的是專門為了陪葬而製作的物品，被視為不祥或忌諱。在傳統中，明器不僅少有文字提及，更別說是收而藏之。㊻ 然而，羅振玉所提倡的古物保存概念，改變了傳統上對這些墓葬用品的看法。㊼ 最早在1907年，羅振玉首次於北京琉璃廠的古玩鋪裡，購入出土於河南地區的兩件陪葬人俑。它們伴隨其他古物而出土，古玩商雖知其乏人問津，但收購整批出土物時，遂包含其中，順帶運至北京。㊽ 這兩件人形俑，不僅是羅振玉收藏明器的開始，也是明器進入近現代中國古物保存論述的起點。

羅振玉收藏中有部分人俑，顯然出自1905年洛陽地區因鐵路修築工程而發掘的墓葬群。羅振玉和某位日本收藏家是最早開始收藏這批墓葬出土明器的人物；㊾ 然羅振玉對明器的興趣，並不僅止於收藏，他更名其居所為「俑廬」，以誌其入藏，此舉可說是羅振玉古物保存作為與古物研究的分水嶺。㊿ 1909年，也就是羅振玉首次收藏人俑後兩年，四件羅振玉所收藏的人偶在珂羅版雙月刊《神州國光集》刊出（圖1-1、1-2）。1916年時，它們又出現於羅振玉自己出版的珂羅版圖冊《古明器圖錄》中（圖2-1、2-2）。

㊺ 見容庚，〈序〉，《金石書錄目》（北平：商務印書館，1930）。容庚是介於傳統金石學與現代考古學的轉型期人物，其他的金石學學者則仍保有較傳統的觀念，不認為「金石」範疇的擴張是全然正面且可行之路。例如，陸和九，〈序〉，《中國金石學》（1933；上海：上海書店，1996）。

㊻ 見羅振玉，〈序〉，《古明器圖錄》。

㊼ 見鄭德坤、沈維鈞，《中國明器》（北平：哈佛燕京學社，1933），頁8-10。

㊽ 見羅振玉，〈序〉，《古明器圖錄》；《俑廬日札》，收入《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第17冊（臺北：大同書局，1973），頁6920-6925。

㊾ 見富田昇著，趙秀敏譯，《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鑒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2。

㊿ 「俑廬」的「俑」字，即為人俑之意。羅振玉為其1910年左右所書筆記取名《俑廬日札》，並發表於《國粹學報》上。此學報乃晚清知識份子間最富影響力的學報，後《俑廬日札》以單行本行世。關於《俑廬日札》的出版狀況，見羅繼祖編，〈「俑廬日札」拾遺〉，收於《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2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頁2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古明器圖錄》並不是羅振玉旅居京都時所編唯一具有開創性的古代文物研究書籍，其他還有關於模范、古陶器、封泥及壁畫的圖錄，其中任一物件皆是傳統收藏或研究時所未及的類別（圖3-1、3-2）。[51] 在這些圖錄的序言裡，羅振玉總是反覆提及文化保存及研究中國古代文物的重要性，並強調外國人已開始競相購求並研究圖錄中的古物。[52] 這些圖錄的出版年代都很早，可見羅振玉應是古物保存風潮中的先驅。「古物保存」主張所有中國過去所製造出的歷史文物都應是國家遺產，都值得被保存與研究。這看法與日本1871年展開的古物保存運動遙相呼應，日本在此潮流裡所列舉的三十一種古物類別，便企圖涵蓋日本各個歷史階段裡所製造或所輸入的所有文物，並將之等而視為國家遺產。[53] 然而，即使羅振玉古物保存的理念取用了日本的思考架構，他仍得解決如何重新定義、重新分類中國古物的問題，例如傳統上歸類為「金石」類的物品，日本並無此種分類。

人俑之所以從令人忌諱的明器，搖身一變而為值得收藏的物品，都源自古物觀念的轉變。除了明器外，收藏石碑原物（而非其拓片）的風氣也是新的改變。收藏石碑在傳統金石學裡固非罕見，[54] 然一般而言，收藏家多將收藏重點放於拓片，而非原石。拓片較利於古文字學之研究，而原石則因重量與體積的關係不易搬運與保存。當石碑上可資研究的文字不多，如佛教造像碑等，則金石學的研究者往往棄而不顧。羅振玉則不然，他積極地購藏新發現的碑石，無論其上有無可觀的文字。[55] 就收藏文化的角度而言，收藏態度的轉變賦予「原石」或「原器」新的意義；其上有無可資研究的古文字，已非收藏的重點所在，此種轉化在近現代更是明顯。例如，《神州國光集》在1911年左右便刊出

---

[51] 例見《齊魯封泥集存》（自印本，1913）、《古明器圖錄》、《高昌壁畫精華》、《殷墟古器物圖錄》及《古器物范圖錄》。

[52] 見羅振玉，《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53] 鈴木広之，《好古家たちの十九世紀》，頁7-18。

[54] 根據葉昌熾的說法，北宋時始有收藏石碑的風氣，於清代收藏家間亦時有所聞，其中最著者為陳介祺。見葉昌熾著，柯昌泗評，《語石》（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563。

[55] 見羅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收於《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第2冊（臺北：大同書局，1986），頁533。羅振玉也曾阻止外國人帶走「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見羅振玉，《俑廬日札》，頁68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幾件佛教造像碑，其上並無明顯的文字。[56] 換言之，在古物保存的新潮流及珂羅版複製技術的運用下，「原石」在新的古物概念裡有了新的定位，亦成了「國光」的一部分。

不同於其他「古物保存」的倡議者，羅振玉本身即是金石學家，而他的作法自對廿世紀初傳統金石學的轉化有著深遠的意義。如前所述，傳統金石學主要以銅器或石碑上的古文字為研究對象，藏家們多不考慮物件的形制、材質與裝飾紋樣，或至少不認為這些元素與銘文具有同樣的歷史意義與重要性。換言之，多數金石藏家將原本三維的、立體的青銅與石碑，等同於二維的、平面的、佈滿古文字的拓片。

十九世紀中葉後，從陳介祺開始，金石收藏家們流行「全形拓」，將青銅全器的各面拓下組成一完器，以保留原器的樣貌與時間的軌跡（圖4）。當一張紙無法全部拓盡立體的器物時，有時也局部運用木刻印刷或攝影技術拼接而成。「全形拓」在當時也是一種藝術形式，除了收藏家外，書畫家也用於創作，本身即具鑑賞與收藏之價值。故「全形拓」雖得其形、得其質於原器，卻有獨立於原器之外的美感。[57] 相較之下，用於保存原器與原石樣貌的珂羅版複製技術，則不具有獨立藝術形式的地位。珂羅版所複製的文物圖像，僅被認為是忠於原件影像的複製品，具有傳達原件如實訊息的能力。十九世紀下半葉，金石學的基本假設並未受到全形拓的影響，仍以古文字學為中心。直到二十世紀初年後，金石學的核心觀念才有所改變。改變的原因相當複雜，不過新發現文物的驟然勃興與珂羅版技術的同步輸入，應促成金石學家反思以古文字學為依歸的研究主旨。無論原件是青銅、陶瓷或石碑，珂羅版技術皆能精密地複製各種形狀、材質及裝飾的細節，文字的地位不再是唯一（圖5）。

歷史文物本身不可分割的價值乃古物保存的重點所在。以珂羅版技術翻製的圖像因能同時展現物品的材質及三維的立體性，自成為調查、登錄的第一

---

[56] 見《神州國光集》，第20集（1911年農曆四月）、第21集（1912年10月）。

[57] 關於「全形拓」的討論，見Thomas Lawton, "Rubbings of Chinese Bronzes," pp. 7-48; Wu Hung, "On Rubbings: Their Materiality and Historicity," in Judith T. Zeitlin and Lydia H. Liu, eds.,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of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2003), pp. 29-72; Qianshen Bai, "Wu Dacheng and Composite Rubbings," in Wu Hung, *Reinventing the Past*, pp. 291-3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步。藉著珂羅版印刷術，古物的圖像也將留傳久遠，而達到保存國家遺產的目的。當珂羅版的出版品中，拓本的比重漸漸變少，三維立體性的實物照片卻愈來愈多時，金石學的重點，也不得不有所轉變；從古文字學轉向對全件的研究，如形制、材質及裝飾紋樣等。有些金石學家將此轉變認為是金石學由傳統轉入現代的過渡，金石學的研究對象亦因此而從銅器及碑銘拓片，擴展到一切新發現的文物。[58] 然而，羅振玉對此卻有不同想法，他為古物設想了更廣大的視野。他不將此研究轉向視為「金石學」本身的過渡，而視之為新的研究領域，融合了傳統與西方的學術淵源，用以處理日漸龐大的新發現文物。他稱此研究領域為「古器物學」（簡稱「器物學」），明白指出此學科乃是立基於「器物」這個新的分類上。[59]

四、「器物」vs.「書畫」的二元分類架構

儘管「器物」一詞的用法可追溯至二千年前，這個詞彙卻在新的古物研究領域裡獲得新的意義。傳統用法裡的「器物」，泛指一切可使用的工具或器皿，而非一種分類的概念，亦不具有分類的效能。然分類系統乃古物研究的發展基礎，「器物」遂被援用來指涉三維空間的古代文物，並不考慮物件的材質；無論以銅、泥、玉、金、銀、鐵、骨、木、竹、玻璃或其他材質製成，都可納入其中。傳統金石學講究銅器或碑石上的文字，從未包含所有的三維物件。然而，「器物」對古文物卻無所不包，只要不是書法（包括拓片）、繪畫或織繡即可。此一對「器物」的定義，在羅振玉清末時期的文章裡即可得見，而在其1910年代的出版品裡更加確立。至於此詞的學術性用法，其1919年討論器物學的專著《古器物學研究議》提供最好的範例。羅振玉在「器物」作為一獨立分類的發展上，實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器物」不但取代了「金石」，成為與「書畫」相對應的類別，亦改變了既有古物分類系統的樣貌。

---

[58] 容庚與朱劍心皆視廿世紀初年為金石學轉化的關鍵時期。見容庚，〈序〉，《金石書錄目；朱劍心，〈序〉，《金石學》（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59] 見羅振玉，《古器物學研究議》（天津：貽安堂，約1920）。感謝許雅惠教授告知此文，以及Youn-mi Kim幫助筆者找到此資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羅振玉於1906年至1911年在北京為官，寓居北京的經歷不僅讓他得以擴充其收藏，亦令他以新的眼光看待古物。[60] 當時北京的古物交易市場，正因皇室收藏的非法流出與新發現文物的大量出現而蓬勃發展。[61] 羅振玉在北京時的筆記裡即曾感嘆傳統金石學在面對此一情境時的侷限，因金石學完全忽略了未刻有古文字的歷史文物。他亦意識到自己在北京古玩舖中所見的古文物亟需一個分類上的定位，遂提出以「器物」名之的看法。[62] 而羅振玉此處所謂的「器物」，指的則是陝西河南一帶新出土的文物，特別是古代的車馬具。[63]

「器物」一詞在羅振玉之手獲得新生之際，正是日本新辭彙與新譯語大量流入中國之時。基於羅振玉與日本的深厚淵源，我們不禁要問，「器物」是否像「藝術」一辭一樣，也是日本取用的傳統中國語詞，經過日人賦予新意義後，再轉而輸入中國，成為「新」詞彙？1871年日本政府開始推行國家古物保存運動時，的確使用了「古器旧物」（*kokikyūbutsu*）一詞以統攝三十一種古物門類，包羅所有於日本製造或輸入到日本的歷史文物。[64] 然而，這個包羅甚廣的詞彙，雖有「器」與「物」二字，卻與羅振玉所提出的「器物」概念有別，而是包含所有歷史文物的全稱詞。明治（1868－1912）中晚期時所出版的字典，對「器物」（*kibutsu* 或 *utsuwamono*）的解釋，基本上指的是茶會中所使用的器皿或成套的物件，與羅振玉的定義有所不同。[65] 我們雖然難以查知日本的「器物」一詞如何轉化為目前的慣用法，然某些廿世紀初年出版的日文書籍，已開始使用「器物」指稱所有立體、三度空間的古物，並不限於器皿或茶具。[66]

---

[60] 見陳邦直，《羅振玉年譜》，收於周康燮編，《羅振玉傳記彙編》（臺北：大同圖書公司，1978），頁93-98。

[61] 見富田昇，《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鑒賞》，第一章。

[62] 見羅振玉，《古器物識小錄》，收於《金文文獻集成》，第37冊（香港：明石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4），頁380。

[63] 見羅振玉，《古器物識小錄》，頁380-393。

[64] 鈴木広之，《好古家たちの十九世紀》，頁7-18。

[65] 筆者曾依據飛田良文《明治生まれの日本語》中所列出的明治中晚期字典，查閱「器物」一詞的解釋。《明治生まれの日本語》（京都：淡交社，2002），頁222-223。

[66] 例見小室新蔵、松岡寿，《一般図案法》（東京：丸吉書店，1909）；赤津隆助，《教育略画の際》（東京：啟發社，19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中日間的互動究竟對於研究立體、三度空間的古物有何影響，雖是個有趣的問題，卻很難追索。無論如何，就羅振玉使用「器物」一詞的時間及其用法所涵蓋的廣度而言，羅振玉都是促成「器物」作為一門類而「器物學」作為一門新學問的先驅。

羅振玉1910年代間所編纂與出版的圖錄，便收羅許多三維的古物，我們可以藉此窺知他所賦與「器物」的現代用法。其中有三本圖錄的題名，包含有「器物」一詞，指的都是難以依傳統「金石」、「書畫」之分來歸類的古物。

其一為《古器物范圖錄》，收有製作銅器與陶器的范具（圖6）。其二為《殷墟古器物圖錄》，收有新出土於晚商首都殷墟的古物，多為獸骨或骨器（圖7）。殷墟出土物於1911年時為羅振玉所收藏，當時其弟羅振常（1875－1942）赴殷墟遺址收買甲骨文片。眾所周知，中國於1899年始意識到甲骨文的存在，此一發現被視為近現代中國第一批揭露中國上古史原先不為人知面向的文物，不僅對中國的自我文化認同有所影響，也確立中國在世界古文明史上的地位。羅振玉的特別之處，在於他不但深知甲骨文的價值，也特別囑咐羅振常將其他的出土物品一併帶回。[67]《陰墟古器物圖錄》裡有大量的獸骨及骨具，多是小件且不太特殊的物件，在在證明了羅振玉的學術信念，以及「器物」這一門類統攝包含的特性。

第三本圖錄則是《雪堂所藏古器物圖》。羅振玉在這本圖錄裡，以「器物」一詞，涵蓋其收藏中所有三維的古物；有趣的是，其中還包括許多小件的佛教造像（圖8）。[68] 小件的造像，既非日用器皿或特定用具，卻也納入「器物」的範圍，點出了「器物」與「書畫」二元並存且對立的分類法則。「器物」乃是一門有別於「書畫」，而與「書畫」相對立的類別，分類標準在於平面與立體或二維與三維，此標準具有統攝所有物品的能力。[69]

中國傳統的古物或收藏品分類標準，主要在於物品的形質、製法、功能或製造處等的不同，從未考量物品之平面或立體維度此一抽象的數學原則。如果

---

[67] 見羅振常，《洹洛訪古游記》(上海：蟫隱廬，1936)，卷上，頁1-2。

[68] 見羅振玉，《雪堂所藏古器物圖》、《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頁2581-2592。

[69] 時至今日，佛教雕刻的研究在國立故宮博物院裡仍為「器物處」所轄，然在一般的中國藝術史研究中，不管是在臺灣、日本或中國，「器物」一詞都不將雕刻造像算在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談銅器與瓷器或銅、瓷器內部之別，僅就最重要且範圍包含最廣的「金石」與「書畫」之別討論；這二個分類並未如「器物」與「書畫」般對等而對立，換言之，也未能合成二元、非此即彼的分類架構。例如，石碑拓本既可從屬於「金石」，亦可歸類為「書畫」，端賴分類者的重點。如果強調其在古文字學上的重要性，則屬於「金石」，如果討論的是書風的特質與可否在書法史上當作標準的範式性，則是「書畫」。更何況，諸如「瓷器」與「文房之寶」等，既不屬於「金石」、也不算是「書畫」，卻在藝術鑑賞與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只好單獨自成一類了。

直到廿世紀初，二元並存且對立的古物分類架構才開始出現。傳統上「器物」一詞並不具有統攝性，也不指向固定的類別；既無知識論上的基礎，在人們的認知中自成一類，也未因之產生一種與「書畫」相對的認知方式或研究方法。然而，到了羅振玉所在的二十世紀初，「器物」已成為一類別，並於所指涉的範圍與內容上，與「書畫」兩相對立；此二者之分野，就在物件不同的空間維度上。兩者合觀，則成一相互排除（mutually excluded）的分類系統。整個古物分類系統於重新組織、重新定位中國古物的同時，亦有所轉化，轉而成為一個將二維與三維物件截然分立的分類體系。

在物質文化的研究取向影響藝術史學之前，西方傳統的藝術分類系統，將藝術品分為「繪畫」、「雕刻」、「建築」及「裝飾藝術」等四個主要的類別，亦具有相互排除的特性。繪畫與雕刻、建築不可能相混，品類分別也影響到學習與研究方法隨之不同，也就是知識論的基礎有所差異。物質文化研究興起於1980年代，衝擊到中國藝術史時，已近1990年代初期。⑦⓪ 此一研究取向對繪畫研究的衝擊顯而易見，原先根據德國藝術史學傳統中對於繪畫與雕刻等的區別，即在二維與三維，也就是平面與立體的分別；此種依據平面與否而來的分類標準可見雕刻可依脫離平面的程度再細分為淺浮雕（較接近平面）、浮雕與立雕等，而將繪畫視為平面的基本假設，影響學者如何接近（approach）與研究繪畫。無論畫面形式分析或圖像學皆將繪畫視為平面；反之，在物質文化研究中，回歸繪畫本身的物質性，因此繪畫作品作為物體的裝裱、流傳與觀看方

⑦⓪ 最好的例證當然是Craig Clunas,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式、脈絡等，才轉而受到重視。

由此觀之，二十世紀初年中國新出現而以「器物」與「書畫」相對立的二元架構，或許可說是中、西方對藝術分類之概念有所交涉容受的成果。西方的藝術分類系統至遲在1917年左右引進中國，可見於史上第一本美術史教科書，即姜丹書的《師範學校新教科書美術史》。此書大量抄襲日人著作，並不具有原創性與研究性質。[71] 然而，重要的是，我們對此書的討論一則可見當時西方藝術的分類系統已出現在民初中國，再則也可自比較中，見出羅振玉分類系統的特色。

姜丹書之教科書依前述西方藝術分類的架構綜論中西藝術，但為了呼應中國傳統對書法的重視，遂以傳統的「書畫」分類，將書法納入當中，試圖在中西方傳統對藝術不同的分類架構中取得調適。該書以「工藝美術」之名，統括陶瓷、青銅、玉器、漆器與織繡等。[72] 此分類將具有「功能性」的藝術品類全歸之「工藝美術」，來自西方藝術傳統對於非功能性精緻藝術（fine art）與工藝美術之別的基本假設。當然，陶瓷、青銅等歸為一類也符合清末以來自「實業」生產的角度審視工藝美術的看法，[73] 其出發點與羅振玉不同。羅振玉的「器物」分類轉化傳統的「金石」，自當時新發現的文物出發，並未顧及西方藝術傳統的分類，也不考慮實業生產與商業利益的部份。

依據羅振玉1919年的專論《古器物學研究議》，其中十五類的「器物」分類中，並未論及「建築」，與「雕刻」相近的次分類則見「梵像」。「梵像」仍來自傳統的觀念，一如「造像」，考慮的是基於宗教因由而具有人形的三維物件，浮雕及立雕皆有。

再者，姜丹書「工藝美術」與羅振玉「器物」並非相等的範疇，例如：「工藝美術」中的織品與繡品並不囊括在「器物」中。羅振玉並未觸及織繡品，也未在十五類的「器物」中包含織繡品。然而，若就前述羅振玉「器物」

---

[71] Cheng-hua Wang, "Rediscovering Song Painting for the Nation: Artistic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rtibus Asiae* (forthcoming).

[72] 姜丹書，《師範學校新教科書美術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頁44-51。

[73] 關於清末民初實業與美術的關係，見吳方正，〈圖畫與手工—中國近代藝術教育的誕生〉，收於顏娟英，《上海美術風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6），頁29-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分類的原則與基本假設看來，織繡品應屬於「書畫」。時至今日，兩岸的故宮博物院裡，織繡都隸屬於「書畫處」管理，而非「器物處」。[74] 其中的理由也可想見，中國的織繡多半以模仿書畫為宗。無論羅振玉的分類與同時的姜丹書有何不同，我們皆可見到來自不同傳統的文化元素，如何交融、統整而促成中國文物與藝術分類系統的轉化。

五、成立一門新學問

「器物」一詞直到今日，仍是日常生活與學術圈中的常用詞彙。暫且不論其於日常生活中的用法，「器物」已是藝術史學界與考古學界裡具有固定涵義的學術字眼，且可用以指涉各種工具、器皿、武器、儀器及其他用於日常生活或祭祀儀式中的物品。

當民國初年「器物」漸成為一固定的古物類別時，「器物學」亦於1910年代後半興起。當其時，興於宋、清兩朝的金石學已呈衰象，關心金石學走向的學者如羅振玉，正亟思以一現代的治學方法取而代之。另一方面，考古學和藝術史學分別於1920年代末期與1930年代初期引進中國，這兩種現代學科均有能力處理當時大量發現的文物，這些文物或剛出土，或久被主流思潮遺忘，直到清末民初才浮出學術之表。[75] 與考古學和藝術史學相較，羅振玉所提出的「器物學」，並無西方固有學科的光環加持，故在中國學術界裡，未被視為一門獨立學科，頂多可稱之為研究領域。然而，「器物學」並非毫無自己的天地，它依舊在中國的學術圈裡生存，能與考古學與藝術史相接，並能發展出對古物研

[74] 臺北與北京兩個故宮博物院的組織架構，亦可佐證此處所討論的二元並存且對立的分類結構，因為兩者皆有書畫處與器物處。另外，1914年10月成立於紫禁城外廷區域的古物陳列所，其展覽館的區別也是書畫與器物分置於文華殿與武英殿兩處。見Cheng-hua Wang, "The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 Circa 1905-1925," pp. 331-333.

[75] 此處關於考古學與藝術史學於中國成立的大致時間，乃是以民國時期此二學科的出版品數量來推定。見北京圖書館編，《民國時期總書目》，文化　科學　藝術（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頁162-234；歷史　傳記　考古　地理，頁507-509、636-637、717-747。亦參見Magnus Fiskesjö and Chen Xingcan,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004), chapter 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的獨特著眼點、研究方法與學術標的。這些治學上的要求，早在羅振玉1910年代出版的圖錄中便具雛型，更於其1919年《古器物學研究議》得到進一步闡釋。

羅振玉雖未留下任何類似今日學術文章的論文，他在1910年代後半所出版的諸多圖錄及短文、筆記等，卻為器物學研究的先河。比方說，圖錄裡許多器物皆以等比例複製；若無法印出器物的原本大小，也會將原尺寸附上。羅振玉曾在一〈序〉中特別說明，此一特色乃是為了要能更深入地研究個別器物。⑯以珂羅版技術精準地複製出器物的造型、材質及裝飾，也是出自便於研究的學術考量，同時點出了器物學的研究重點，在個別的器物本身（圖9）。羅振玉所撰的圖版說明，一般多描述器物的形貌，討論器物功能與技術細節，並以此與相關的文獻記載相比對。就這些圖錄的視覺與行文特色而觀，羅振玉實奠立了今日器物學研究的基礎，貢獻顯見。

羅振玉在京都時期對器物學的努力，獲得北大校長蔡元培（1868－1940）的注意。1919年年中羅振玉回到中國，蔡元培隨即邀請他到北大考古系任教。羅振玉並未答應，但以一篇論文回函蔡元培。⑰該文即是《古器物學研究議》，羅振玉在文中表達了古物保存的關懷如何使之投身於學術的研究，並敘述「器物學」的理念與研究方法，實為「器物學」研究的藍圖與總結。

論文中，羅振玉將「器物學」與傳統「名物學」及外來學科如古生物學及佛雕研究連結。「名物學」乃經學中的一支，原是對《詩經》裡提及的草木、蟲魚、鳥獸、礦石及人造物的考察；其主要目的在於幫助瞭解經典的文本，而非研究物器之本身。⑱至於佛教雕塑，由於中國學術傳統對此不甚重視，歷來並無學術論著、美學理論或鑑賞系統可資參考，成果遠遜於歐洲與日本的研究。於此，羅振玉認為中國應學習外國的長處。

---

⑯見羅振玉，《殷墟古器圖錄》。

⑰見羅琨、張永山，《羅振玉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6），頁89-90。該文於1919年發表後，次年收於《雪窗漫稿》，改名為〈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查對兩文，後者在文章開始處增多數言，從這幾句話，更可見該文原意在於回答蔡元培對於古器物學的詢問。見〈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雪窗漫稿》，收於《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篇，第1冊（臺北：文華出版公司，1958），頁75-85。

⑱見王強，〈中國古代名物學初論〉，《揚州大學學報》，第8卷第6期（2004年11月），頁53-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前所述，該論文還條列了「器物」的十五種門類，囊括了廿世紀初所有新發現與出土的文物。[79] 羅振玉更能在各類中一一舉出個別的器物說明原委，在在顯示他對於這些列舉器物有著相當程度的熟悉，例如：這些器物在中國、歐洲或日本的所在地等等。羅振玉對於個別器物的嫻熟度，並非來自於文獻上對這些古物的描述，而是基於對實物或實物圖像的反覆檢視，甚至是觸摸所得。其中並有些器物是羅振玉自家收藏，如車馬具、明器及佛像等，都各自成為一類。這十五類中，有一類將漢代（206 BCE－220 CE）畫象磚石及唐（618－907）、宋時期的卷軸畫歸為一類。乍看之下，似乎有違「器物」相對於「書畫」的大原則。姑且不論畫象磚石並非傳統上認可的「繪畫」，羅振玉之所以將畫象磚石與古代卷軸畫也歸入器物學的範疇，實因他所倡議的器物學研究需要透過古代圖像對於器物的描繪，以了解器物樣貌。如此一來，漢畫象磚石及早期的卷軸畫便成了瞭解器物的管道之一，因為它們留存了古代器物的圖像。

羅振玉雖將「器物學」的源頭指向中國的學術傳統，然他對器物可見之形制及可觸之材質的重視，則與現代考古學與藝術史學若合符節。羅振玉這篇論文也指出，若無實物、實物的珂羅版圖片或實物的翻模複製品在手，欲進行器物學研究與保存古物，幾乎是緣木求魚。

經由對於器物本身的研究，羅振玉意欲改正古文獻的錯誤，這與一般歷史研究重文獻、輕實物的研究取向相反。這不禁讓人聯想到王國維於1925年所倡議的「二重證據法」；此法將考古發掘納入中國上古史的研究中，依此寫成的上古史，自有別於只根據傳世文獻而來的觀點。[80] 中國對歷史的了解及其學術導向，原本是建立在以文獻為本的悠久傳統上；如今，於此傳統之外，考古發現或出土的器物又提供了另一考究歷史的途徑。羅、王兩人長期以來的學術往來，無疑對羅振玉「器物學」概念的形成貢獻良多。兩人對器物研究的共同興趣於1919年左右更為明朗；此時期所交換的信件中，甚至有一封附有手繪的古器物圖。[81]

---

[79] 見羅振玉，《古器物學研究議》。

[80] 「二重證據法」被視為中國上古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突破。關於其重要性，見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366-373。

[81] 見《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421、461-462、4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今視昔，器物學出現的時間點可說是介於金石學與考古學之間。前者將全副精力放在解讀古文字上，而將三維的器物等同為二維的拓片；後者則意在掌握考古遺址中各層位的出土情況，並研究遺址之文化與週遭的生態環境，又不同於器物學之專注於個別器物本身。器物學的研究方法及基本假設與古物保存風潮密不可分，並來自對金石學的不滿；其與考古學的關係可分可合，合之處在於考古學亦處理出土遺址的器物，器物學可稱之為分支。然而，在1920年代後期，當西方考古學學科在中國逐漸成熟之時，考古學家或為了建立自己學科的獨立性、學術超然性，以及全然不同於傳統的「現代」形象，積極地宣稱他們與傳統的金石學、脫胎自金石學的器物學有重要區別。[82]

有三件值得一提的例子。一是1929年時，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拒絕聘任馬衡（1881－1955），當時史語所正開始發掘安陽遺址。馬衡是羅振玉的私淑弟子，並於1920年代初與羅振玉往來密切。[83] 與哈佛出身的考古學家李濟（1896－1979）相比，馬衡對器物的研究取向，被認為過時。[84]

第二例是史語所初始發掘安陽時，地方人士懷疑其動機，聯想及盜賣古物的商人。李濟與董作賓等考古學家形成共識，決不收藏任何古物，以取信於人，因為這些出土物應為公有。日後在李濟的回憶中，此點印證了兩人對於現代考古學立場的堅持。[85] 由此看來，羅振玉式融合古物商、收藏家、出版人與研究者的身分，在李濟眼中，想必是過時而不符合現代考古學信念與價值的作法。

最後一例則是容庚（1894－1983），他是中國青銅器的研究先驅，也是羅振玉的弟子，繼承了羅振玉所立下的器物學方法。他所撰述的圖錄與研究，日後皆成了器物學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卻未若同時代的考古學家（如李濟

---

[82] 關於1920年代後期考古學在中國的成立與興起，以及其與金石學的衝突，見王汎森，〈什麼可以成為歷史證據〉，頁366-373。然王汎森之文並未提及器物學，亦未言及圍繞著金石學、器物學與考古學等關於學科成立與古物保存的複雜議題。

[83] 見《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頁484、501。

[84] 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古今論衡》，第1期（1998年10月），頁25。

[85] 李濟，〈南陽董作賓先生與近代考古學〉，《感舊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頁100-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等人）受重視。[86]

然而，器物學的研究儘管於1920年代末期為學者所輕，這個研究領域在學術界裡仍有不可或缺的地位。李濟與史語所後來亦正式承認器物學是考古學裡的一支，並出版一套研究叢書，其題名中便有「器物」二字。[87] 更重要的是，「器物學」的成立，不僅標誌著古文物之現代轉化，亦揭示了古物保存並非孤立於當時思想、社會與文化之外；例如，它與學科的重整與建構，實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中國古文物的概念，在廿世紀初古物保存的脈絡下，產生了極大的變化；其最著者，則為古文物分類系統之重整。「器物」門類的成立，體現了藝術與古物在重新分類、重新定位之過程中的複雜性。這是個不斷往復交涉的過程，雜然且異質，內有多個不同的傳統彼此交纏、整合。再者，「器物」門類的成立，亦於學術之外，產生了政治、社會與文化上的效應。一套清清楚楚的分類系統，正是政府推行古物保存的前提。日本政府1871年的古物保存計畫，就確立了卅一種古物類別。

晚清至1930年代的中國，確實是考古發現與國際藝術交易市場的黃金時代。羅振玉則是其間最熱衷於古物的知識份子，他的個人收藏亦昭示著新時代的來臨。這是個視古物為國家遺產的時代，所有的古代遺存物都值得保存，也都應該展示。羅振玉於1910年代的出版事業，將其致力於器物學的努力，形諸於物（出版品）。「器物」這個新分類，於當時，改變了傳統的古物分類系統；於今日，更突顯了廿世紀初在中國，金石學、器物學與考古學（甚至是藝術史）之間複雜的學術網絡與互動關係。

（責任編輯：黃心怡）

[86] 容庚初見羅振玉於1922年，他帶著自己對古文字學的研究向羅振玉請益。見容庚，《頌齋自訂年譜》，收於《容庚容肇祖學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頁223-225。1928年容庚被史語所聘為特約研究員，然其學術地位卻未若李濟般受人推崇，可自史語所七十週年的紀念文集窺見。見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87] 見石璋如，〈李濟先生與中國考古學〉，收於《新學術之路》，頁151-160。另外，董作賓對於羅振玉的成就相當推崇，尤其是其保存古文物與倡導明器研究的貢獻。見董作賓，〈羅雪堂先生傳略〉，頁1-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近人論著

小室新蔵、松岡
1909 《一般図案法》，東京：丸吉書店。
王汎森
2004 《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村伸夫
2000 《中国近代の書人たち》，東京：二玄社。
水尾比呂志
2003 《国華の軌跡》，東京：朝日新聞社。
王強
2004 〈中國古代名物學初論〉，《揚州大學學報》，第8卷第6期（11月）。
王國維
1927 〈宋代之金石學〉，《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頁45-49。
王慶祥、蕭文立校注
2000 《羅振玉王國維往來書信》，北京：東方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編
1994 《民國時期總書目》，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
石璋如
1998 〈李濟先生與中國考古學〉，收於杜正勝、王汎森編，《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151-160。
白謙慎
1999 〈二十世紀的考古發現和書法〉，收於國立歷史博物館編，《1901－2000中華文化百年論文集》，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頁244-257。
朱劍心
1948 《金石學》，上海：商務印書館。
杜正勝
1998 〈無中生有的志業〉，《古今論衡》，第1期（10月），頁4-29。
杜正勝、王汎森編
1998 《新學術之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七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赤津隆助
1910 《教育略画の実際》，東京：啟發社。
李濟
1985 〈南陽董作賓先生與近代考古學〉，《感舊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頁100-1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002 〈探索階段：甲骨文的搜集、考釋和初步研究〉，收於氏著，《安陽》，石家莊市：河北教育出版社，頁19-37。

沈松僑

1984 《學衡派與五四時期的反新文化運動》，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吳大澂

1883 《說文古籀補》，蘇州：振新書社。

吳方正

2006 〈圖畫與手工—中國近代藝術教育的誕生〉，收於顏娟英，《上海美術風雲》，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頁29-45。

吳雲

2004 《二百蘭亭齋收藏金石記》，收於《金文文獻集成》，卷7，香港：明石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頁508-558。

林志宏

2009 《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社。

岡塚章子

2000 〈小川一真の「近畿宝物調查写真」について〉，《東京都写真美術館紀要》，第2號，頁38-55。

姜丹書

1917 《師範學校新教科書美術史》，上海：商務印書館。

飛田良文

2002 《明治生まれの日本語》，京都：淡交社。

神州國光集。

浅原達郎

1987 〈「熱中」の人—端方伝〉，《泉屋博古館紀要》，第4期，頁68-73。

范曄

1983 《後漢書》，收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5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容庚

1930 《金石書錄目》，北平：商務印書館。

2004 《頌齋自訂年譜》，收於《容庚容肇祖學記》，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頁222-230。

唐培吉

1992 《上海猶太人》，上海：三聯出版社。

陳介祺著，陳繼揆編

1991 《秦前文字之語》，濟南：齊魯書社。

2004 《簠齋鑑古與傳古》，北京：文物出版社。

陸和九

1996 《中國金石學》，上海：上海書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陳邦直
1978 〈羅振玉年譜〉，收於周康燮編，《羅振玉傳記彙編》，臺北：大同圖書公司，頁73-134。
陳芳妹
2001 〈宋古器物學的興起與宋仿古銅器〉，《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0期，頁37-160。
2005 〈追三代於鼎彝之間－宋代從「考古」到「玩古」的轉變〉，《故宮學術季刊》，第23卷第1期（秋季），頁267-332。
張惠儀
2005 〈遺老書法與新出土書法材料—二十世紀中國書法發展的契機〉，《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19期（9月），頁163-208。
晨鐘報。
富田昇著、趙秀敏譯
2005 《近代日本的中國藝術品流轉與鑒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鈴木広之
2003 《好古家たちの十九世紀》，東京：吉川弘文館。
董作賓
1962 〈羅雪堂先生傳略〉，《中國文字》，第7冊（51年3月），頁1-3。
葉昌熾
2005 《語石》，北京：中華書局。
端方
1909 《陶齋藏石記》，自印本。
潘祖蔭
2004 《攀古樓彝器款識》，收於《金文文獻集成》，卷7，香港：明石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頁559-611。
鄭德坤、沈維鈞
1933 《中國明器》，北平：哈佛燕京學社。
《羅雪堂先生校印書籍價目》，收於徐蜀、宋安莉編，《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第28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頁111-129。
羅琨、張永山
1996 《羅振玉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羅振玉
1913 《齊魯封泥集存》，自印本。
1916 《高昌壁畫精華》，自印本。
1916 《古明器圖錄》，自印本。
1916 《古器物范圖錄》，自印本。
1916 《殷虛書契後編》，上海：廣倉學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19 《殷墟古器物圖錄》，上海：廣倉學窘。
約1920 《古器物學研究議》，天津：貽安堂。
1923 《雪堂所藏古器物圖》，天津：貽安堂。
1958 〈與友人論古器物學書〉，《雪窗漫稿》，收於《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篇，第1冊，臺北：文華出版公司，頁75-85。
1973 《俑廬日札》，收於《羅雪堂先生全集》，五編，第17冊，臺北：大同書局，頁6781-6926。
1973 《雪堂所藏古器物圖說》，收於《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第6冊，臺北：大同書局，頁2581-2592。
1986 《雪堂金石文字跋尾》，收於《羅雪堂先生全集》，初編，第2冊，臺北：大同書局，頁419-610。
1999 《集蓼編》，收於《雪堂自述》，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頁1-123。
2002 《雪堂校刊群書敘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4 《古器物識小錄》，收於《金文文獻集成》，第37冊，香港：明石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頁380-393。
2005 《扶桑兩月記》、《扶桑再遊記》，收於張本義、蕭文立編，《羅雪堂合集》，第6冊，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

羅振常
1936 《洹洛訪古游記》，上海：蟫隱廬。

羅繼祖
2007 《我的祖父羅振玉》，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

羅繼祖編
1981 〈「俑廬日札」拾遺〉，收於《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2冊，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頁268-273。

Bai, Qianshen
2010 “Wu Dacheng and Composite Rubbings,”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The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p. 291-319.

Betta, Chiara
1997 “Silas Aaron Hardoon (1851-1931): Marginality and Adaptation in Shanghai,”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London.

Bonner, Joey
1986 *Wang Kuo-wei: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own, Shana Julia
2003 “Pastimes: Scholars, Art Dealer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1870-1928,”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Carroll, Peter

2006 *Between Heaven and Modernity: Restructuring Suzhou, 1895-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lunas, Craig

1991 *Superfluous Things: 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1 "Images of High Antiquity: The Prehistory of Art in Ming Dynasty China," Dieter Kuhn and Helga Stahl, eds., *Die Gegenwart des Altertums: Formen und Funktionen des Altertumsbezugs in den Hochkulturen der Alten Welt*, Heidelberg: Ed. Forum, pp. 481-492.

Fiskesjö, Magnus and Chen Xingcan

2004 *China before China: Johan Gunnar Andersson, Ding Wenjiang, and the Discovery of China's Prehistory*,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Furth, Charlotte, ed.

1976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ong, Zaixin

2007 "Moving onto a World Stage: The Modern Chinese Practice of Art Collecting and the Impact from the Japanese Art Market,"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The Role of Japan in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Art*,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October 18-20.

Hsu, Ya-hwei

2010 "Reshaping Chinese Material Culture: The Revival of Antiquity in the Era of Print, 961-1279,"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chapter 3.

Lawton, Thomas

1989-1990 "Jin Futing, A 19th-Century Chinese Collector-Connoisseur," *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vol. 54, pp. 35-61.

1991 *A Time of Transition: Two Collectors of Chinese Art*, Lawrence: Spencer Museum of Art,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

1995 "Rubbings of Chinese Bronz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 67, pp. 7-48.

Maeda, Tamaki

2007 "(Re-) Canonizing Literati Painting in the Early Twentieth-Century: The Kyoto Circle Luo Zhenyu, Harada Gorō, and Naitō Konan," 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The Role of Japan in th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Art*,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October 18-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Masini, Federico
1993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Mitter, Rana
2004 *A Bitter Revolution: China's Struggle with the Modern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wson, Jessica
2001 "The Many Meanings of the Past in China," Dieter Kuhn and Helga Stahl, eds., *Die Gegenwart des Altertums: Formen und Funktionen des Altertumsbezugs in den Hochkulturen der Alten Welt*, Heidelberg: Ed. Forum, pp. 397-422.

Reed, Christopher A.
2004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Steuber, Jason
2005 "Politics and Art in Qing China: The Duanfang Collection," *Apollo* (November), pp. 56-67.

Wang, Cheng-hua
2010 "The Qing Imperial Collection, Circa 1905-1925: National Humiliation,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Exhibition Culture," Wu Hung, ed.,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The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p. 320-341.
2011 "New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Heritage Preservation: Collotype Reproduction of Antiquities in Modern China, Circa 1908-1917," Joshua Fogel, ed., *The Role of Japan in Modern Chinese Ar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orthcoming).
Forthcoming "Rediscovering Song Painting for the Nation: Artistic Discursive Practices in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Artibus Asiae*.

Wang, David Der-wei
1997 *Fin-de-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Wu, Hung
2003 "On Rubbings: Their Materiality and Historicity," Judith T. Zeitlin and Lydia H. Liu, eds., *Writing and Materiality of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for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pp. 29-72.

Wu, Hung, ed.
2010 *Reinventing the Past: Archaism and Antiquarianism in Chinese Art and Visual Culture*, Chicago: The Center for the Art of East Asia, University of Chicago.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版出處

圖1-1 土偶人寫真，《神州國光集》，第五集（戊甲十月）。

圖1-2 土偶人寫真，《神州國光集》，第五集（戊甲十月）。

圖2-1 土偶人，羅振玉，《古明器圖錄》，卷一，頁6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2-2 土偶人，羅振玉，《古明器圖錄》，卷一，頁13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3-1 古陶量，羅振玉，《雪堂所藏古器物圖》，頁1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3-2 封泥，羅振玉，《齊魯封泥集存》，頁4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4 周饙鐘鼎，鄒安，《周金文存》，卷二，頁61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5 造像石，《神州國光集》，第二十集（辛亥四月第二號）。

圖6 模范，羅振玉，《古器物范圖錄》，卷上，頁3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7 骨器，羅振玉，《殷墟古器物圖錄》，頁1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8 佛像，羅振玉，《雪堂所藏古器物圖》，頁40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圖9 銅勾，羅振玉，《雪堂所藏古器物圖》，頁10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